

論儒林外史

何滿子著

論 儒 林 外 史

何 滿 子 著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論 儒 林 外 史

何 滿 子 著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2 弄 18 號)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002 號

協 興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發 行

*

書 號 96

開 本 787×1092 耗 1/32 印 張 3 1/16 字 數 61,000

一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1—20,000 定 價 (7) 0.28 元

目 次

一	吳敬梓的道路	1
二	为人民的作家	8
三	实生活和作品	16
四	风格即人	24
五	吳敬梓的理想人格	31
六	照妖鏡下的封建社会	40
七	吳敬梓的天才的性質	48
八	“創作总根于爱”	53
九	表現方法的特征	63
一〇	“儒林外史”的結構	70
一一	从楔子窥全豹	81
一二	“儒林外史”的价值和影响	88
	后記	92

28943/3

一 吳敬梓的道路

蘭台家世千秋重，
藝苑文章四海傳。

——題王澗山左茅右蔣圖

儒林外史，是吳敬梓(1701—1754)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活動為“主文”的、詩人對他的時代生活的判決書。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

……精神活動微弱的人……做了詩人或藝術家的時候，他的作品除了再顯出他自己所最喜愛的事物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意義了。可是當一個人，他的精神活動被由於觀察生活而來的問題所強烈地激發，而又恰巧賦有藝術才能的時候，他的作品就意識或無意識地表現出一種企圖，想要對他所感到的事物，給以活生生的判斷。①

吳敬梓正是被生活中的問題激發起了強烈的精神活動，而又恰巧賦有藝術才能的一個人。他的儒林外史，也正是以高度的藝術才能，表現了和批判了那激發着他強烈的精神活動的生活的真實的作品；質言之，現實主義的作品。儒林外史卷首有一篇閑齋老人的序②，其中有兩句話，對這小說的性質作了簡約的然而極切要的提示：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玄虛荒

渺之談也。

所謂“迥异玄虛荒渺之談”，就是說，吳敬梓的作品是真實生活的寫照，是被生活中的問題激發出來的。所謂“外史”，顧名思義，是補正史之所不書，也就是閑齋老人這一序文中所說的“史之支流”的意思。但因為作家是被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問題所激發，藝術地描敘了那蘊含着問題的生活之真實，又且帶着深刻的思想對所表現的歷史內容作了公正而尖銳的評衡，那末，他雖不將作品“自居于正史之列”，却要比那些羅列

⊙ 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周揚譯，群益出版社版頁 135。

⊙ 這篇序寫明作於乾隆元年（1736）春二月，這年月是不可靠的。因為這序的口氣，是寫於儒林外史已經完稿之後；而事實上，同年三月，吳敬梓還在被征赴博學鴻詞的省試；那末，以杜少卿自況的吳敬梓決無預知他將被征和辭避的事情。有論者說這是作者於小說作成後託名的自序，但未具確証。按事理論之，託名而又託一個年月，實在費解。而且這序文筆調，也大不類吳敬梓的文字。1874年刊行的齊省堂本，在這序前冠有“原序”字樣，我因而曾疑心這篇序是第一個刻印儒林外史的金兆燕託名寫的（據金和跋文中說：“外史”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金兆燕於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任揚州府教授。）；我認為因他深知吳敬梓，而一個府學教授的地位，也不便宣揚同時代人作的“稗史”，因此化名作序。是以後來的刊本題作“原序”。但後見1803年的臥閑草堂刻本，這序前並無“原序”字樣。這樣，既未見金兆燕的初刻本，又不知齊省堂本的祖本即初刻本，或只是以臥閑草堂本為據，這序文的作者就只好存疑了。又有論者認為閑齋老人可能就是臥閑草堂主人，並且根本懷疑是否存在過金兆燕的初刻本，說臥閑草堂本可能是這書的創版。如果說閑齋老人可能就是臥閑草堂主人，這從兩個名字同一“閑”字的巧合上，還有可信之處；但如果竟連臥閑草堂本以前曾有金兆燕的初刻本這一點也懷疑起來，却難以置信。金刻本應肯定它是有的。其一，有金和的記述；其二，和吳敬梓同時代的程晉芳既說“竟以稗說傳”，足見“外史”是已經刊印傳世，而不僅是手稿的了。

現象甚至歪曲真实的正史更予人以多方面的教益。也即是說，由于这种“活生生的判断”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逼真的不加粉飾的描画上的，所以便更具体而动人。从而，那作家和作品便愈加为害怕揭露真实的統治集团所痛心疾首。因此，对于吳敬梓这样一个人和“儒林外史”这样的作品，即連并非伪道学或腐儒的、而且知他甚深的程晋芳，也尙且作了这样讚賞中含有輕蔑味的惋叹：

外史紀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那末，这部所謂稗說之遭到旧时代庸俗的知識分子群——即所謂“儒林”——的冷淡和輕視，以及这个怀有超越凡流的心胸的作者之“終受歇于拙目”[⊙]，就更不足为奇了。

这个偉大作家在生前备受世俗的訕笑詆諆，他的偉大的創作在將近一个世紀里受到了极其冷淡的待遇。虽然据金和在跋文中所記，金兆燕在任揚州府教授时(1768—1779)就把它刊印了，但就这一初刻本今日不获覓見这一点来判断，可知流布是不广的。現存的最早版本臥閑草堂本的刊行，距作者之死已經整整半个世紀(1803年)。这說明，这部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和批判了时代生活的作品，如何地受到了構成旧日讀書界的士大夫的嫉恨和排斥。同时，我們也可以从作品誕

⊖ 程晋芳：春帆集怀人詩十八首之一中句。

⊙ 文木山房集移家賦中句。賦中述及自己“乃众庶之不眷”的情况，有“……眷念乡人，与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粟而致鼠”；“竟有造請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扶仆；誰为倒屣之迎，空有溺壚之辱。”等句。当时受人白眼之况，殆难堪已极。又集中刊庚戌除夕客中作“减字木蘭花”八闋，其三有云：“田廬尽卖，乡里傳为子弟戒”。可見吳敬梓所受的社会輿論的非薄，有常人之所不能受者。

生以迄“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一长时期内很少有人评述它这一事实，看出这样的消息：这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是如此地真实，它的评击是如此有力，以至被它的讽刺所激怒了儒林君子，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在难以反驳的真实之前缄口无言。他们只有采取冷淡的方法来抵制。儒林外史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即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这些划时代的历史事变，清朝封建统治机体已经从内部腐烂到表皮，为吴敬梓所猛烈攻击的科举制度也无法再维持下去的时候，才有了较多的刊本，得到了较广的传布。但比起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较它晚出的红楼梦来，还是差得远。当然，流行的程度和作品的价值比较，更远远地不能相称。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常常深感到旧时代欠了伟大的古典作家们一笔很重的债。不仅在物质上，旧社会没有给古典作家优秀的精神生产以报酬，使他们往往终生备受生活的煎熬；特别是在精神上，没有拿公道去对待他们的崇高而艰辛的劳动，他们呕心沥血的对人民的奉献。封建统治思想把小说看成“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小道”，“君子弗为也”，“芻蕘狂夫之议”^①；斥为“诬蔑失真，妖妄荧听”，“猥鄙荒诞，徒乱耳目”^②……因此，我们前代的天才们不能把文艺当作他们生活中的主要事业；在社会舆论的白眼下，只能悄悄地、象干着一件卑微的勾当那样地进行他们的创作；而专制的封建制度和庸俗的社会气氛又压低着诗人的想象活动。在这种条件下，只

① 汉書艺文志論小說語。

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小說語。

有那些能使自己伸根入雄偉的人民生活的深处，善于从生活中吸取剛强善美的滋养，从而鍛煉得使自己具有偉大的心的勇力，敢于与世俗頑抗的高貴的心灵，才能冲破漫漫長夜的沉悶的空气，唱出清亮的战斗的声音来，宣示人民意志的終不屈服，显露那培育出瑰丽的艺术花朵来的人民的黑土的深厚的潛力。不用說，这种偉大艺术家本身也是他所处在的时代的歷史条件的产物，而且他們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受着自己时代的約制，表現着思想上和艺术方法上的历史性的局限，但因为他們拥有巨大的艺术能力，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自己时代的人民生活，他們的作品便具有永不消失的魅力、獨創性和美；他們也因自己的偉大的劳作而不朽，而引起后代人民无穷的感念。吳敬梓便是这种杰出的人物之一。

吳敬梓生長于累代科甲的閥閥世家，他的曾祖輩弟兄五人，有四个是进士；他曾祖吳国对且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內，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門”[⊖]。他的祖輩也都显达，如吳昺是康熙三十年的榜眼，吳晟是进士；他的亲祖父死得很早，也做了州同知。他父亲吳霖起是康熙丙寅年的拔貢，出任江苏贛榆教諭。生長于这样声势显赫的門第中，吳敬梓便厮混在官宦、乡紳、膏粱子弟、科場中人、名士、清客堆里，看透了他們污濁的灵魂，識破了上层社会的种种丑相。官宦嗎，一簇顛頂昏聩、徇私舞弊的蝨賊；乡紳嗎，一帮武断乡曲、趨炎附勢的惡棍；膏粱子弟嗎，一些不通庶务，仰仗父兄財勢，

⊖ 方嶠：文木山房集序。

揮霍度日的昏虫；科場中人嗎，一群鼠目寸光、利慾薰心的陋儒；名士嗎，一伙附庸風雅的市儈和混江湖的吹牛匠；清客嗎，一堆騙子。吳敬梓如果是一個平庸的、“精神活動微弱”的人，他可以充當上述的任何一種角色，在做社會的寄生蟲的生涯中安逸地、渾渾噩噩地打發他的一生。但他不，庸俗、虛偽、卑劣和無聊的生活激怒了他，他辭謝了、鄙棄了命運帶給他的這些“恩惠”；他選擇了另一種行徑，挺身與命運、與世俗搏鬥。紳籍家庭培養出了一個紳籍階級的叛徒。

吳敬梓接受了他的前輩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師的先進思想，特別是受了他們的逃避荐舉，拒絕仕進，不與統治者妥協的高風亮節的感染。這是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信仰的堅毅的人，當他信服了某種思想，景慕了某種行為時，他便奉之為自己言行的規範，愈來愈堅決地要求自己貫徹到底，甚至堅決得達到了任性的地步。這樣，他也就和循着統治秩序，唯功名利祿是求的當時一般的知識分子有了分歧，而且也和他自己的家人先輩走着不同的路，從而，他也就愈來愈和庸俗的社會輿論不相協調。發展到這樣的情況，人便必須從下面兩條路中選擇其一：要嗎屈服於庸俗的社會輿論，要嗎和它決裂而邁向自己的目標。吳敬梓，這勇敢的人毅然地選擇了後者。他從事於生活中更崇高、更美好的境界的追求，他杜絕了鑽營和仕進之意，將祖產在資助貧困者的豪舉中花盡，將庸奴們視為金飯碗的祖宗基業視作敝屣，遠遠地離開了那對他側目嗤笑的家乡全椒，駕一葉扁舟，卜居于秦淮河上。連士大夫視為稀世之榮的博學鴻詞的征辟，也托疾不赴^①；甘願衣食不周，安貧樂道地度過他自己所歎羨的“嶽崎磊落”的一生，一如他的理想人

物王冕似的。他的不平凡的遭遇，他的高傲的品格，他的不願和統治集團同流合污的超拔的精神，他的痛恨旧社会并毫不容情地揭露它的丑惡的倔強的战斗气魄，以及他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不朽巨作儒林外史里。

儒林外史所展示的社会生活面是极其广阔的，但它篇幅最多、刻画最着力的则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它的辛辣尖刻的諷刺的矛头正对着“儒林”，即封建統治思想的代表集團。吳敬梓恰巧以他的“稗說”狠狠地打击了那些“稗說”的輕視者，那些卫道的“正人君子”。在今天看来，那惋叹其“竟以稗說傳”的程晋芳，当他兴起有些瞧不起“稗說”的思想活动的一刹那，也正代表了“正人君子”的腐朽的观点，从而也就和那些鄙儒庸夫一道，成了他的偉大的友人“刻画工妍”的巨笔所鞭撻的对象了。

⊖ 胡适在吳敬梓年譜中，硬說吳敬梓不应**稗**是真的为了生病。他的最有力的証据，是推荐吳敬梓的江宁教授唐时琳在文木山房集序言中的說明。但是很显然的，如果吳敬梓装病而首先不瞞过他的举荐人，怎么还能瞞过別人呢？唐序中“兩月后，敏軒病愈，至余齋，……余察其容顏頓，非託为病辭者。”云云，自然同样可以作为唐时琳被他的装病所瞞过了的解釋。既然在这样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上向外界装了病，所以他在丙辰除夕述怀詩中，便也有了“夫何采薪忧，遽为連茹厄”的句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託病的次年，吳敬梓就写了鬪青然兄一詩；既然連胡适也不得不承認鬪青然兄和貧女行兩詩，分明是对应了了的他的堂兄的嘲笑，那末他自己的不願赴試，就极为明显了。不錯，他曾应学院和撫院之考，但那可能是推荐者的感情难却，也可能是試期和荐期迫近，倉卒間不能突然装病之故。至于說丙辰除夕述怀詩中吐露了追悔未能赴試之意，也是极自然的：其一是要实生病之託詞；其二是，“鷄肋糜人”、“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不能要求封建时代的吳敬梓完全没有。

二 为人民的作家

一事差堪喜，
侯門未曳裾。

——春兴之五

人們反抗现实，常常从他們的切身利益出发。他們选择那他們認為最厉害地阻碍着他們的出路、束縛着他們的自由发展的势力，作为攻击的目标；当他們的攻击比較深入时，就必然会提高到对一种社会制度的反抗，于是他們的斗争便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质。如果他們所反抗的对象正是窒息社会进步的制度和势力时，他們的切身利益也就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成了人民的要求的体现者，从而他們的反抗行动也就成了进步的革命的行动了。

知識分子的吳敬梓，便从知識分子的切身感受出发，进而攻击那桎梏着知識分子和社会思想的科举制度和八股习尚；他明确地認識到他所攻击的对象，乃是妨碍知識分子和社会正常发展的根本性质的禍害。

具有制艺文章的家学淵源，且“其学尤精文选，詩賦援笔立成，夙構者莫之为胜”^①的吳敬梓，要从八股文騙取功名，决不是难事；但他卑視这种奴性的“举业”，卑視除了經書章句和墨卷以外一无所知的昏庸的干祿之徒。因此他“生平見才士，

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①。

痛恨科举制度，瞧不起八股文和那些自以为“代圣贤立言”的八股专家的，明、清兩朝的卓識之士中頗不乏人。例如顧炎武，就是攻击八股取士制度最力的一人。他在日知录里說八股教育是“国之盛衰，时之治乱”的禍根；并且痛切地說：“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②吳敬梓受了这离他未久的先賢的思想影响，更由于悲痛的现实的亲历目击，使他对科举制度怀着深惡痛絕的态度。在儒林外史楔子中，他也和顧炎武一样，借王冕的嘴批評八股科举制度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文行出处都看得輕了。”他認為实行这种弊害无穷的科举制度，是“一代文人有厄”。不但文人有厄，而且使全社会蒙受毒害，各阶层的人們都給这制度塑捏得阴阳怪气，一如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揭示的。他既認識和痛恨这种制度的危害性，因此便毕生以全力和它进行斗争。

有清一代統治知識分子的方法虽有多种，例如：初期的大兴文字獄的屠杀政策，康乾兩朝的刪改古書以及設博學鴻詞科籠絡名儒等等；但最基本的手段还是变本加厉地襲用明代的科举制度来訓練知識分子做奴才。只要这一制度行之有效，思想上的禁錮便基本上达到了。任何意識領域中的斗争要是

① 程晋芳：吳敬梓傳。

② 同注①。

③ 日知录卷十六“經义論策”条。

不損害这一全面網罗知識分子的制度，就不能在思想战綫上动搖清皇朝的統治。縱或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上的某些部門有所进展，但这些进展在这一奴役制度的前題下，也只是奴隶甚至奴才的帶着枷鎖的跳舞：这跳舞也許真是精致的、有用的艺术，可是却不能直接改变人民的被奴役的命运。

魯迅在杂文算帳里写道：

說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說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証据也真够十足：解經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論家虽然經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沒有看懂的古書……

……但失去了全国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頁光榮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賺了利，还是折了本呢？①

当然，魯迅並沒有叫人要輕視清代学者治学的功績的意思；他只是从历史的教訓，揭露那些“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的洋翰林胡适之流的真面目。胡适之流当时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統治下，拚命叫人不問政治，不关心社会，埋头到研究室去治学，仿佛只要少数学者有了成就，社会政治便会得救的一样。为了使这种荒謬的說法言之成理，“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流便努力強調“康熙大师”和“乾嘉大师”的作用，似乎他們的存在，便已經使清朝統治者的思想統治无能为力，已經使統治集团特为思想統治的主力的入股毒焰变成了不能伤人的“死老虎”，也似乎那些清代的文人如王士禛、袁

① 魯迅全集第五卷頁571。

枚，朴学大师如戴震、阮元等人，倒不是从八股文应试出头，或者他们能出汗泥而不染，一点不沾八股气的一样。胡适在吳敬梓年譜中便这样说：

有人說：“清朝是古学昌明的时代，八股的势力并不很大，……何以吳敬梓單描写那学者本来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岂不是俗話說的打死老虎嗎？”……看这篇“年譜”的人，可以看出吳敬梓的时代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清朝第一个时期的大师，毛奇龄最后死。……文学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禛也死了。当吳敬梓三十岁时，戴震只有八岁，袁枚只有十五岁，……当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八股的气焰忽然又大盛起来了。……这正是吳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时代。懂得这一层，我们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正价值了。（重点系原文自有——引用者）

这种論調的可笑之处有：第一，代表昌明的古学而致八股老虎于死地的康熙大师刚一死，“八股的气焰忽然又大盛起来了”，妙哉！那末这些大师們以及他們的古学的力量也就实在太脆薄得可憐了；相形之下，八股倒并不是死老虎，而那些大师和古学却是紙老虎了。第二，儒林外史既因出现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才有真正的价值，那末，到了乾嘉大师一起，古学重又昌明起来之后，应运而生的儒林外史岂不是又要随八股之忽然又变成死老虎便应运而灭了嗎？

这真是道地的实验主义——主观观念論者的謬說。自己鑽在研究室里，膜拜在几个清代大师的衣裾之下，便以为他們就是当时社会精神状态的全部，或者以为这少数浮出在社会文化頂端的学者的思想便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的統治

性的現象；于是便只見树木不見森林地將作为統治全社会的八股的毒焰看得无足輕重一如死老虎；好象“学者們本来都瞧不起”，入股势力便会从客观存在消失的一样。不用說，追随着这种論調去考察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只会得到荒謬的結論；从而对吳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真正价值”只有使人“格外不“明白”，只有抑低。

事实上呢，誰也知道，不管古学多么昌明，学者們如何瞧不起入股，可是直到清末廢除科举为止，有清一代的絕大多数讀書人都是把做入股文考取功名当做唯一的出路的；儒林外史所刻画的周进、范进們，甚至到科举制度廢除后也还是活生生的存在。不但如此，連絕大多数瞧不起入股的朴学大师們，自己也是不免借入股文作敲門磚而取得了荣宗耀祖的功名利祿的。即使他們在丢了敲門磚以后治了古学，但几个鳳毛麟角的朴学大师，在茫茫入股秀才的人海中，也不过有如蕞尔小島，决不能改变大海之为大海，狂瀾之为狂瀾。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运动的发軔，原是由于宋明理学、特别是晚明“狂禪”一派的反动，开其先河的大师顧炎武，其治学方針，照梁启超的看法，有三大特点，即第一“貴創”，第二“博証”和第三“致用”[⊖]。为了貫徹这三点要求，特别是要达到“貴創”和“致用”，就必然要反对那束縛創造性的科举取士制度，那和經世之务了不相干的入股制艺；顧炎武、黃宗羲等宗师所以便正是科举制度和入股文的坚决反对者。但康乾以降，繼起的朴学家們只片面地发展了他們的前輩的“博証”这一端，便成了單

⊖ 見梁著：清代学术概論第四节。

純地做考据功夫了。自然，考据要比游談无根切实得多，但考据一旦成为治学的唯一方法，甚至降而形成“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以后，也就和“貴創”与“致用”各不相謀，丧失了思想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价值了。如果說，朴学大师們所反对的明代的学风是理学与帖括携手，那末，他們所造成的局面也不过是以瑣屑的考据代替了空疏的理学[⊖]，使考据与帖括联盟而已。古学既不和科举制度相悖逆，不能損及清朝精神統治的基础，便无法动搖社会风尙的根柢；而千千万万的八股秀才事实上也不会因为朴学的存在甚至繁荣而放弃做八股文，而减少他們的冬烘气。即使古学家嬗递不息，古学并不中衰，不出現所謂“青黄不接”的时代，吳敬梓所諷刺的社会現象，所打击的社会势力也是鉄一样地存在的，而且是作为精神領域中的最根本的痼疾存在的。这一现实存在，朴学的盛衰便无以增損现实主义作家吳敬梓和他的杰作儒林外史的价值。

是的，吳敬梓晚年也治过經学，著有現已失傳的詩說七卷，說他是乾嘉經学的先鋒亦无不可[⊙]。但他主要的精力却放在攻击时弊，特別是攻击八股毒焰的儒林外史的写作上。这是从程晋芳的“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的詩句里就可以想見的：程晋芳的时代詩說当然沒有散佚，那末，我們从他的悼叹里，就可以看出詩說和儒林外史的比重来了。这样，在思想斗争的战綫上，吳敬梓是將他主要的精力正面投入对反动統治者最强大的防綫的攻势中的。經学虽然和入股的精神有所分歧，但却为統治集团所容許。因为每一时代，“永远有着某一部分思想为革命者和旧制度底拥护者所同等地承認的。最有力的攻击用来攻击那些特定的时期中是旧制度底最有害方